

■新作聚焦

## 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

## 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

□曹文轩

《红楼梦》中——甚至是在更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就看到中国文学家们对风俗画的喜爱。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风俗画的描绘则已蔚然成风,并对风俗画的意义有了十分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在倾向于写风俗画的沈从文那里,还是在并不特别在乎写风俗画而另有意图的鲁迅那里,都有许多地道的风俗画描绘。进入上世纪80年代,风俗画的传统又再度续上,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登峰造极,汪曾祺等人以及他们的书写一时成为批评家和文学硕士、博士们的热门论文题目。在此风尚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批伪风俗画的作品。

但到上世纪末,文学被其他种种心思所牵,更因时代气场的转移,这一风气式微,风俗画与我们的文学渐行渐远。恰在此时,付秀莹不声不响地出现了。她竟然又开始了与这一传统的情然连接,并且更加专注与认真,也更加自然。我们在她的几乎全部作品中都看到了她的这一难以消退的兴趣。也许在她这里,这并非是一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她的觉得既然书写乡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入风俗画——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些繁多的风俗。它不仅影响了乡下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情趣,也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乡村故事是与这些风俗纠缠在一起的。

生老病死、婚丧礼仪、民间宗教以及各种各样乡村节日——有些节日也许不仅仅属于乡村,但乡村有乡村的方式,一个乡村又有一个乡村的方式,这一切才使乡村生活成为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它们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风俗画,一代一代延续着,常看常新。我们发现这些风俗又常常是与中国特有节气联系在一起。因此,节气便成为她的作品的重要元素,最终导致她写节气就无法让她的人物出场、无法开始故事的叙述。这部长篇小说一开头,竟然用好几页文字,不慌不忙地按时序写了各种节气以及与节气相关的若干风俗。接下来的叙述与描写,风俗画无数次地镶嵌在她的行文之中。我们现在无法设想,若将全部风俗画从她的作品移除出去,她的小说是否还能存在。当然,我们也会这样发问:若无这些风俗画,乡村生活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是乡村生活?

就付秀莹而言,她沉浸于风俗画的书写,可能还因为这种书写满足了她的审美情趣。这种情趣含有诗性,含有远古的缥缈与神性。

世上小说无非两种,一种是写日常经验,一种是写震惊经验。

付秀莹的小说通常只写日常经验,而不写震惊经验。无论《爱情到处流传》等短篇小说还是这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琐事。这些事情甚至连事件都谈不上,只能算作事情。这些事情平平常常,甚至平平淡淡,事情的发展很难说有什么高潮,更难说高潮迭起。她的作品经不起我们认知的小说情节设计的通常格式去衡量,因为它完全是按另样的小说理念写就的,搭不上。这些小说理念几乎就是她个人的,因为我们在以往的小说史上,还很少见到如此日常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曾有新现实主义浪潮兴起,一批作家热衷于日常经验的写作,“一地鸡毛”成为那个时期写素材的象征。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日常经验依然在情节上是有很用心的安排的。而付秀莹的小说,看上去在情节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心机和计划的。我们甚至很难说她的作品有什么情节。面对她的小说,过去的那套小说艺术的条条框框,几乎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可是只要开始阅读,你又无法抗拒它的阅读魅力。就在比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经验还要日常的日常经验之中,我们被她的看似平常的叙述无声

地掌控,而不知不觉地失去自己。

当我们真正回到人类生活的本真状态时,也许我们会承认付秀莹是有理的:人的日常状态就是如此,并无大起大落的事情,也无看上去特别严重的事情,一切就是那么回事,并非如从前小说写的那样忽上忽下,波澜壮阔——波澜虽有,但弧度很小。小是小,却依然抓人,甚至比那些写震惊经验的小说还要抓人。究其道理,大概就是如此状态更切近实际存在之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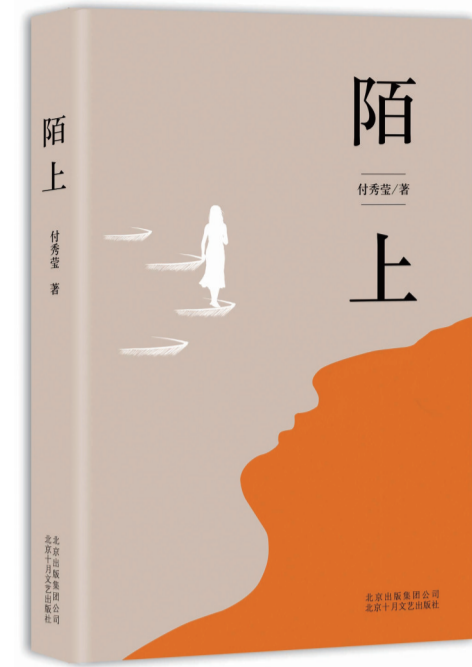
但付秀莹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事实:这世界上并非没有震惊经验,但这些震惊经验,常常是日常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突然爆发。付秀莹创造了付秀莹式的结尾:还是一副平平淡淡的样子,还是一种平平淡淡的叙述,最后事情忽然陡转,变得异常严重。看似突然,但细察,就觉得这般严重实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必然的结果,人家是早有伏笔的,完全合乎逻辑。这些结尾往往只三言两语,并且在叙述上依然波澜不惊。这就是付秀莹的小说艺术。

在付秀莹这里,文学性是至高无上的。她的院校背景,我们似乎在她如此乡村的作品中不太能看得出来。我们似乎很难将如此风格的文字、情调和生活,与她高等院校的学习背景联系起来。新时期出来一批有院校背景的作家,但他们的腔调以及关注的生活领域,显然与她两样。即使写乡村,也一定不是这样的乡村。一看就是局外人。院校培养了一批这样的作家。那么,付秀莹的学院背景果真没有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吗?否。我们只要仔细追究,细心体会,就会很容易在她的文字背后看到一种文学态度,而这种态度一定是与院校背景有关的,这就是:十分看重作品的文学性——并且是十分纯粹的文学性。她的打着付秀莹烙印的文体本身,就是院校学习的产物。与她同时,写乡村的小说很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上就能发现她的乡村小说与非院校背景的作家所写的乡村小说的明显差异。我们这里无意说两者高下,而只是说一个事实。

她写,肯定不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写乡村生活,在写的过程中,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小说是一门艺术”的理念固执地坚持着。她会考虑结构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语调的问题、意境的问题……一切小说要考虑的艺术问题。大概也正是她如此在意小说的艺术问题,由她创造的这些文本才会成为我们今天文学批评的话题。关于她的小说,我们有许多话可说。比如风景描写。我们很少看到今天的小说家像她如此迷恋风景。这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而在她这里,若没有这些风景,文字活动简直无法进行。阅读她的作品,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一路风景。而她的风景又是别具一格、气象非凡的。她的风景背后,似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韵。世间万物,在她这里,都是有灵的。再比如她小说中的象声词。她的小说永远是有声音的,风声雨声,蝉鸣蛙鸣,这世上,就没有无声之事物。而她的象声词常常是她独创的。“远远地,谁家的鸡开始打鸣儿了。我——一声儿,我——一声儿,我——又一声儿。紧跟着,像是故意凑热闹,又有一只鸡叫起来。我——我——我——我——我——我——”“雨丝细细的,一簇簇一万簇银针似的,从半空里落下来。落在树木上,花草上,苏苏苏苏的乱响。”“骑上电动车,日日日日就走了”……这些象声词,远比我们从前的词典里规范的象声词更形象更准确也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她的作品似乎开创了一个象声词的新时代。再比如……

付秀莹的小说世界是极大丰富的。“付秀莹文体”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脉相承,又是她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

■创作谈



惟有故乡不可辜负

□付秀莹

一向不大好意思写创作谈。总觉得,一部作品出来,就由不得自己了。是好是坏,得读者说了算。

然而这一回是个例外。对于《陌上》,竟然有很多话要说。随着年纪渐长,对故乡的牵挂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也是初老症状之一呢?河北老家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里的人和事,那里的草木砖瓦、鸡鸣狗吠,都令我在遥远的异乡魂牵梦萦,日夜不得安宁。

我在那个村庄出生,长大。至今那里还生活着我众多的亲人,父亲已经步入了他的暮年,而母亲已经在村庄的泥土里长眠了18个春秋。我同那个小村庄血脉相联,永不能割断。我几乎每天都要给我的老父亲打电话。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是陪他说说家常。我知道他的一日三餐,我清楚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甚至,我熟悉那个村庄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对于“芳村”的痛和痒,我了然于心。

你相信吗?有一度,那个遥远的“芳村”,竟然是我日常情绪的晴雨表。谁家发达了,谁家败落了,谁家添了丁,谁家老了人,恩怨、爱恨、情仇、甘苦……我的心起起伏伏,全是因了“芳村”。父亲的愁眉、姐姐的哭泣、乡亲们奔忙的身影,所有这一切,在我心中肿胀着、肿胀着,令人寝食难安。

我想写写“芳村”。我想写写“芳村”的那些男人女人们。在时代大潮中,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那些乡村人物们,站在命运的风口处,随着时势俯仰,进退失据。他们内心所经历的,也是芳村所经历的。我幻想着,写出了芳村,或许就是写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写出了我们当下的乡土中国。至少,从某个侧面,写出乡土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波光云影。大约,透过这个时代的波光云影,或多或少的,可以领略这个时代的山河巨变。

这部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没有主人公。我的责编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芳村。他的眼睛真毒,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内心。

《陌上》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长篇结构。26个相对独立的短篇,上一篇的某个人物一闪而过,可能恰恰是下一篇里的主角。芳村的那些男人女人们来来往往,关系错综勾连,时时有交错,不断有回响。总共有多少人物出现,我并没有认真计算过。我幻想着,让每一个人都活起来、飞起来,活波波的,成长为独特的这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他们其实一直在我心里折腾着,蠢蠢欲动。如今我放他们出来,放他们在人间走一趟,成败荣辱,要看他们自己的缘分和造化了,我奈何不得。

这部长篇写得辛苦。因为虚构和现实缠绕,有太多的情感牵扯。也因为,要不断地开始。“万事开头难”,《陌上》的写作令我深刻体验了这句话的重量。这是对叙事难度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耐心、意志以及才华的一种考验。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直躁动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惟有故乡和亲人不可辜负。但愿我做到了。

■新作快评

## 宋尾中篇小说《下半城》,《人民文学》2016年10期

## 消失的下半城

□杨康

■评论

下半城是重庆主城的发祥地,堪称重庆的母城,大致范围是:从朝天门沿着东水门、望龙门等至储奇门一线,上边以新华路为限。宋尾的《下半城》借助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下半城”,虚构出一个他精神上的“下半城”,然后又看着这个“下半城”如文中的“老慢”一样消失,我想,他的内心至少有些悲伤吧。

作为一个从湖北迁移而来的异乡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宋尾俨然成了重庆城里地道的老文青。《下半城》里重庆方言的使用,以及对以报业大楼为辐射圆心所描摹的下半城生活,使得小说呈现出极强的画面感和重庆味道。他所写到的下半城的日常生活,我想每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重庆人都会深有感触。路边流着污水的街道、简陋而杂乱的宿舍,宋尾在这样极具人情味的日常生活里,依然怀着文学的理想。

宋尾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媒体人。他排斥着媒体生活,但媒体生活也在排斥着他。对他而言,纸媒的衰落与网媒的兴起,他早就失去了关注的热情,一副疲态让他只想停下来慢下来。又或者,他对过往的媒体生活因为眷恋太深而不愿意跟着时代一起向前。就这样,宋尾以一个媒体人的“不与时俱进”为反抗,留了下来。

一个老文青遇到一个记者,自然而然就孕育出“老慢”这个角色。老慢,一个资深摄影记者的形象,一个饱读诗书的老文青,这是各种角色的宋尾的化身。小说以“寻找老慢”为线索,不断娓娓道来,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熟悉的老慢。老慢第一次在生态农场的消失,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老慢第二次的消失,他的身上闪烁着善良的光芒,遇见一个叫做慧娴的女人,被阳光所有的积蓄,可老慢依然保持着老文青特有的淡定。因为消失,老慢逐渐不被大家理解。其实不是老慢的消失,而是“我”、东灵、老光这些人自身一些东西的缺失。老慢和大家之间的距离,慢慢地造就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老慢,畸形社会的病症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另一看点在于,“我”最终选择了和老慢同样的方式消失。在梦与醒之间,在是与非之间,“我”选择脱光尘世所累而赤裸地躺下。小说的结尾看似有些荒诞,但实际极具指向性。赤裸地死去,不就是我们向大自然的一种回归吗?不就是我们对病态社会的一种远离吗?

《下半城》更像是一篇散文,是对文中以老慢、“我”、东灵为代表的文艺老炮儿的怀念,是对一代老文青兼具老媒体人精神坐标里消失的“下半城”的祭祀。“下半城”的消失对他们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致命的。

■评论

## 老乡的生活总让我们牵肠挂肚

——评蒋巍报告文学新作《这里没有地平线》 □李朝全

农民的生活状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而处于看不到地平线的中国大西南的贵州农村,更是中国能否按时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蒋巍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这里没有地平线》以对亿万老乡牵肠挂肚的关爱,记述和描绘了贵州省海雀村这个“苦甲天下”的村庄与贫困决战,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刻画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领头人、原支部书记文朝荣的动人形象。

蒋巍是一位容易动情的作家。新作采取的叙事策略便是一再施放“催泪弹”,试图用那些令作者不禁落泪的人和事,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

作品中,蒋巍多次写到流泪场景。第一次是彝族姑娘罗养花一曲山歌引发的泪水。海雀村是中国著名的贫困角落,干旱、贫瘠,山里人骨头硬,不会哭。在苗族跳花节上,罗养花的一曲山歌却把所有人都给唱哭了:“锅里断了粮,灯芯没了油,白雪草当被,雨过没路走。/山里的日子眼里的泪,/哪年哪月流到头?/哥你有心喊一声,/妹这就跟你走!/跟你走,死在外乡——不回头……”歌词唱出了大伙儿的心声,引起强烈共鸣,而歌词里所描述的场景,正是当时海雀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痛哭是在村委会分配上级救济衣被时。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的大男人陈明德,因为抓阄没抓到棉被,当即抱头哭号不止,为了劝慰他,抓到棉被的王学芳将棉絮塞给他,自己留下了布套。第三次是在街头,陈明德眼瞧着孪生儿子心满意足地吃着面条和白馍馍,感到自己太没本事对不起家人和孩子,泪流不已。第四次是陈明德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挪用了580元公款,主动向文朝荣坦白,悔恨不已而落泪。第五次是文朝荣拿出自己闺女出嫁的“手礼”帮陈明德偿还挪用的公款,而让陈明德感激涕零。

此外,于同江盼望生个儿子上好日子,在老婆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之后,酗酒打骂,逼死了老婆,在文朝荣的教育下流下了后悔的眼泪;罗养花嫁给李

保华后因对方渴望生男孩而遭遇离婚,回乡后无地耕种的她意外地得到文朝荣的无私支援,将自己儿子的三亩地让给她种,让养花感动落泪;朱玉良多年来对养花不离不弃的爱情,最终打动了养花,几次见面养花都不禁落泪……所有这些场景,都是作者着意捕捉的生活中的动人瞬间。作家也力图将这些生活中原滋原味的内容生动地讲述出来,将海雀村贫困落后的面貌真实无遗地揭示给读者,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振。

恶劣的自然条件、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多子女、疾病交加等沉重的负担,使海雀村的乡亲们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需要依靠外来的救济度日。而在这个村子里,却有一个旗帜一样的党支部及其支部书记文朝荣。他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把好处让给大家,把困难自己扛起。他四次推掉救济粮,每天最早起床,吹响铜哨招呼大伙儿上工,当养花因唱山歌遭到上级“批判”时他挺身而出主动担起责任,为了群众利益他敢于冒犯上级被称为火神爷。改革后,他提出海雀村发家致富三字经。为了鼓励大家少生孩子,他带头做了结扎,还让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儿子和媳妇结扎。为了号召大家上山种树,他把妻子准备给女儿坐月子的一百多个鸡蛋都煮了给大家吃,又带着乡亲们深夜进城先斩后奏“偷走”上万棵松苗。退休后依旧保持本色,背篓、镰刀、笔记本不离身,时刻关心村子的发展……这是一位朴实的村支书,他的事迹很平凡,但他却是千千万万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典型代表,是忠诚干净担当的共产党员干部的突出代表。

文朝荣是作者竭力刻画和倾情讴歌的主角,而罗养花与朱玉良多曲折的爱情故事则给本书染上一层忧伤而美丽的色彩。因为不堪海雀村的窘困生活,罗养花无奈悔了与穷困潦倒的朱玉良的婚约,外嫁到了富裕地区。然而,朱玉良却始终如一地照顾着罗家的生活。等到养花接连生了两个女孩被休回

海雀村,朱玉良毫不嫌弃,两人喜结良缘。是穷困让一对已经定亲的男女分手,又是改革后不断变化的新生活让这对苦命人终成夫妻。这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好折射出海雀村与贫困决战所带来的喜人变化。

作者采取了前后对比的手法,表现脱贫攻坚实施后海雀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华社记者刘子富笔下,1985年时中国贫困角落海雀村苗族老大娘安美珍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缺3个月的盐,一家四口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多日。而到了2015年,安美珍和儿子一家三口住上了120平方米的大房子,家里有沙发、电视机、洗衣机,有牛有马和四只猪,一年收获了两千斤包谷、一千斤养子、一万斤洋芋,饭碗里煮的是白花花的米饭。——海雀村人均年收入近六千元,人均粮食三百多公斤,那段苦甲天下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

在海雀村逐步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上级部门和各级领导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作者如实记述了上自中央下至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向海雀村伸出的援手。这是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的一个走向成功的个案。从这个个案中,我们仿佛看到了2020年七千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国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作为勇于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蒋巍两次深入海雀村,解剖这只微小的“麻雀”,力图描绘出中国梦伟大征程的崎岖坎坷与壮丽多彩。他用自己对老乡无比牵挂无比热爱之心,倾情写下了一部有灵魂有温度的佳作。

作品特别注重海雀村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点,在叙事中更多地描述苗族、彝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为作品镶嵌上了丰富多彩的颜色。譬如,苗族称蝴蝶为妈妈,有独特的跳花节习俗。彝族女孩成年时举行“换裙礼”,谈婚论嫁时必须请巫师“烧鸡卦”,送手礼,结婚时进行“抢亲”等等,都为这部作品添彩良多,赋予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